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動盪中的改革：
國民黨人的自救言論與戰後中國（1945-1949）

計畫主持人：林能士

計畫編號：NSC 89-2411-H-004-009

2000年10月

動盪中的改革： 國民黨人的自救言論與戰後中國（1945-1949）

- 一、前言
- 二、戰時戰後黨內民主的呼聲
- 三、官僚主義、官僚資本主義
- 四、戰後派系政治與黨內民主
- 五、黨內民主與蔣介石的地位
- 六、兩黨論與威權重建
- 七、結語

一、前言

（一）研究旨趣

國民黨政權在抗戰時期遭逢時艱匪淺，有識之士對於黨的形象及權力基礎的流失至感焦慮，抗戰後期乃紛起抨擊黨政表現，期能力挽黨國於傾圮之際。抗戰勝利後，國民黨面臨的挑戰更甚於前，此中包括對日戰爭所遺留的財經窘況與伴隨其間的人謀不臧，黨與政權的民主化問題亦正式浮上檯面，此外，相對於中共的武裝對峙，國民黨的體質與組織能否有效的給予抗擊？凡此種種，均有待存問。

國民黨在戰後四年所受的內外壓力不減反增，有鑑於此，溫和的黨人或殷殷關切、或苦心建言；激進的同志則猛施抨擊，幾有毀黨再造的絕決心意。這些來自國民黨內部的自救言論，貫穿了戰後四年的動盪時局；事實上，這就意味著，黨內輿論和國內政局互為連結，其間的辯證關係既形成了 1949 年中國大陸的最終變局，也塑造了 1950 年國民黨在台灣實施改造的若干張本。對國民黨遷台以後蛻變為一個所謂「新政黨」的現象感到疑惑的學者來說，他們的解答極可能就存在於戰後四年這一段關鍵的時期。

本計畫所謂的「自救言論」，同時指涉那些分散的——具有差異性、多元性的——個人議論，以及若干集中的——具有功能性、統一性的——政治運動的策略與主張（所謂政治運動，例如黨人發起的「革新運動」，或由總裁蔣介石諭令進行的「黨團統一」等等）。開展於抗戰勝利後不久的革新運動係由 CC 系所主導，該運動的部分綱領代表了多數黨員的共識，例如肅清所謂的派系主義、官僚政治與官僚資本主義；但是部分綱領則引發了日後的路線之爭，例如革命與民主孰為先後的問題。這類路線之爭破壞了作為統一性的政治運動的政治功能，實際上，諸如派系主義等等始終揮之不去的黨內積弊，才是那些原欲摘除黨內積習的政治運動最終被破壞的因素。

無論是分散的個人議論，或是集中的政治運動，這些眾聲喧嘩的自救言論所衍發的改革動力與爭執，繼續延伸至 1950 年的台灣。本計畫即擬以黨事為經，時政為緯，詳盡敘述國民黨人最後的救亡努力，與各股政治暗潮，以見證國民黨的自省能力及政治窘境。對於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改革歷史也將做出適當的評價，並揭示戰後四年國民黨人的自救言論與 1950 年改造方案的內在聯繫關係。

（二）研究背景

本計畫是從以下兩個背景中產生的學術研究構想：第一、國民黨黨史研究漸有斷層之憂；第二、傳統國民黨黨史專著大多忽略了戰後

四年國民黨人的救亡努力。關於第一點，就研究數量與主流價值而言，今日國內的國民黨黨史研究日益趨於邊陲化，此與國內政治、學術環境丕變有關。在這情況下，以往傳統黨史專著所缺所略者，在今日便幾乎難有機會補之詳之。關於戰後四年國民黨人的自救言論就屬於傳統史著所缺所略者。

一般而言，戰後四年黨人自救言論未佔有傳統專著的適當篇幅，這至少出於以下兩點原因：第一、傳統專著（特別是中國大陸出版的國民黨通史著作）將黨史當做一部中國現代政治史書寫，使得黨史的「特殊面」隱沒在國史的「普遍面」之下。基本上，國民黨為當時中國的執政黨，黨史不可能脫逸現代政治史的格局，這之間存在著比重拿捏的難題。在九〇年代的台灣，學者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一書有較令人滿意的處理比例；¹但揆諸中共史學下的國民黨通史作品，特別對於戰後四年的敘事，我們只看到執政黨處理國事的一種「普遍性」書寫，卻幾乎難以發現一個政黨面對空前危機時的「特殊性格」。

第二、傳統專著（特別是台灣在戒嚴時期產生的黨史研究）視戰後四年國民黨的表現為一「禁區」。這大多出於失敗者不願重揭過去的創痛所致。事實上，該創痛具體的牽扯到國民黨內部的積弊與腐敗，以往台灣的史學界並不容易在敏感的政治局勢下進行相關圖像的探索與重建，更遑論試圖分析戰後四年黨人形形色色的自救言論了，因為這些言論正具體指陳了黨內各種的積弊與腐敗。

由於戰後四年黨人的自救言論至今隱沒不彰，人們要嘛認為國民黨面對政權的空前危局時一定欠缺自省能力、無動於衷；要嘛可能會相信，國民黨在當時提出的改革良方必定全盤失敗，不足後人一哂。前者不符歷史事實，自不待言；後者也是誤解，至少也是以 1949 年的成敗做出有欠公允的評斷。事實上，我們從戰後四年黨人的自救言論可以發現，這些眾聲喧嘩的言論的確影響了戰後國民黨的形貌——不論是那些共識極高的內容，或是那些分歧頗大的政見。再者，這些

¹ 參見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共五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94）。

黨內輿論和國內政局互為連結，其間的辯證關係既形成了 1949 年中國大陸的最終變局，也塑造了 1950 年國民黨在台灣實施改造的若干張本。任何對國民黨遷台後的表現感到興趣的學者，如不回頭省視戰後四年這段關鍵的年代，勢必不容易弄清國民黨變化的根由。

（三）研究架構：從「黨內民主」出發

戰後國民黨人自救言論的訴求範圍廣泛，各個訴求點之間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關係。因此將這些訴求點分門別類的單獨論述，事實上並不容易澄清歷史的形貌。有鑑於此，突顯一個主題，並連帶分析該主題與其他主題之間的聯繫關係，會是比較容易著手的論述方向。本計畫以戰後黨內民主的呼聲作為研究主軸，因為它同時涉及黨人其他自救言論（諸如官僚政治、官僚資本主義、派系政治、威權領導、兩黨論）的政治企圖、內容、目的，從這裡著手，也能適當的說明國民黨人自救言論的理想性與其背後的現實考量。

孫中山逝世之後，國民黨內的派系之爭常以「恢復黨內民主」作為爭執焦點。黨內異議者藉著「黨內民主」，其實意欲削弱當權者（通常指的是蔣介石）的統治合法性與道德基礎。1940 年代，國民黨的黨內民主聲浪再起，尤以抗戰勝利後的氣勢為最。和訓政初期的爭執比較，這時的黨內民主訴求者陣營更為廣泛，甚至包括以往協助蔣力抗黨內民主浪潮的子弟兵，如 CC 系、黃埔系等。

根據黨內的輿論，由於黨的民主機制不健全，以致在黨政表現上出現嚴重的寡頭統治，黨意無從反映，而上者執意孤行，下者怠惰卸責，更甚者則結黨營私，腐蝕國本。職是之故，從黨內民主的呼聲著手，人們可以發現國民黨的諸多具有連帶關係的缺失與弊端。此外，爭取黨內民主之舉也是黨內政治資源分配不公的產物，因此探討有關黨內民主的呼聲及其連帶的揭弊言論，也有助於人們了解戰後國民黨人自救言論背後蘊含的利益爭執；如果忽視這一點，那麼人們就很容易誤認這些自救言論純粹出於理想光環，這樣片面的認識，將無從說

明戰後改革言論的缺陷，以及最終國民黨在 1949 年退出中國大陸的真正原因。

二、戰時戰後黨內民主的呼聲

對日抗戰時期，國民黨政權曾因民族主義的情緒，短暫的取得民眾的支持。但這個獨大的執政黨在創造一套完整統一的政治制度方面卻不曾成功，行政機構依然是缺乏效率和腐敗的，政府也未能妥善的處理農村問題，而且政府一直沒有全面回應要求政治參與的輿論壓力。²尤有甚者，黨的幹部也和昔日革命年代的犧牲進取精神愈行愈遠，這使得蔣介石深感憂慮。1938 年，正值抗戰軍興之際，蔣介石向他的黨人發出嚴厲的警告：

我請各位嚴重注意，我們的黨差不多已成為一個空的軀殼而沒有實質了，黨的形式雖然存在，但黨的精神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我說這句話，心裡很悲痛，很難過，但是現在的情形，我們革命不但是遇到挫折，而且差不多快要失敗，本黨不但達到艱難而快要消失了，此時不說，將更沒有說的機會，我們此時不懺悔，將更沒有懺悔的機會。現在黨外的人對於本黨的現狀和前途，都看得洞若觀火，有的替我們嘆息，有的替我們著急，我們自己若還諱莫如深，因循過去，怎麼對得起我們的總理和先烈，怎樣對得起我們的國家和痛苦的同胞，……。³

根據蔣介石的看法，國民黨與國民黨人犯了組織鬆懈、紀律廢弛、團體意識薄弱等項的致命毛病，解決之道在於嚴密組織、提振革命精神。

² Lloyd E.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75), p. VIII.

³ 〈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開會詞〉，《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紀錄》，1938 年，頁 103。

⁴但是蔣介石這種由上而下的針貶角度並不符合一般黨員的看法。事實上，國民黨人對於黨的「現狀和前途」，不僅不像蔣所抨擊的那樣「諱莫如深」，而且反倒是討論熱烈。觀察這些黨內輿論的內容可以發現，蔣提出的種種黨的毛病仍舊過於表象，蔣忽視了毛病的背後才是問題的根源。

國民黨政權伴隨著抗日戰爭而愈發明顯的無能與腐化，讓部分黨人對於民心背離的趨勢有所警覺。黨內成員私下論及時局，感慨者有之，鬱憤者亦不乏人。這樣的反應，與外界抨擊國民黨的態度之間，並無太大的距離。⁵在重慶，即使在若干重要的內部會議上，黨內高級幹部也毫不掩飾他們的焦慮之情，認為改革之機，迫在眉睫。戰時任職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的復興社成員唐縱就曾在日記中記載如下：

各方有志青年，咸不滿現狀。抗戰結束，政府如勇敢接受人民不滿之情緒而加以強烈之改革，則人心歸於一統，而天下定，否則必有分裂而發生劇烈之變動。余姑志之，余相信此言不謬也。⁶

國民黨表現不孚眾望，無從振作，黨人時有微詞。唐縱指出「目前的黨，是發牢騷的集團，既無權又無能」，形容頗能中的。⁷一些人嘗試為國民黨找出病根，其中尤以黨內民主不足，似乎是黨員無權無能的重要病源。這些看法與訓政初期的黨內民主呼聲之間，並無太大的差異。也就是說，由於國民黨欠缺民主機制，致使官僚政客、土豪劣紳得免透過民主程序，即能輕易的混入黨內；又因為黨欠缺民主機制，使得這干人等得以規避責任政治的規範，造成黨的腐化。

⁴ 同前註，頁 104-107。

⁵ 參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頁 720-731；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1992），1944 年 10 月 5 日，頁 463，以下簡稱《唐縱日記》；John K.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pp. 241-264.

⁶ 《唐縱日記》，1944 年 2 月 22 日，頁 414。

⁷ 《唐縱日記》，1945 年 4 月 8 日，頁 501。

循著這類的觀點，立法院長孫科在 1944 年 2 月發表的一篇半公開性質演講，以其直言不諱的內容，博得了黨內高級幹部在戰時的視線與同情。在這篇向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學員發表的談話當中，孫科延續他在 1930 年代以來標舉憲政價值的立場，力倡戰後中國勢須走上民權主義、主權在民的道路，並強調國民黨內部的民主化將是扭轉國內政治氣象的前提。過去二十年裡，黨的組織由上而下，省市委員率經中央指派，全代會代表多由圈定。因此，孫科指陳黨內只是做到集權，卻忘了民主的意義和方法。這和孫科所理解 1924 年所揭櫫的民主集權制一本由下而上的精神，顯然背道而馳；於是孫科認為，總理孫中山的遺教並未確實的被其黨人所遵行。⁸

對於那些自恃有幾十年光榮的革命歷史，便想著永遠佔據執政黨地位的貪婪心理，孫科毫不遮掩地向在場聽講的黨政幹部表達了他的憂慮。這位立法院長認為國民黨「背棄了民主的精神」，「使革命黨的作風變成了官僚集團的作風」。孫科並警告：「大凡一個黨，或者是政治上的一個勢力，一旦大權在握，如果不能保持民主的態度，自成了統治階級，便會變為革命的對象。」⁹

孫科的言論獲得不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歡迎與附和，以致黨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必須再接再厲而來的五屆十二中全會上，針對這股要求「黨內民主」的內部輿論，表明他的個人立場。¹⁰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正是以孫科所稱「數十年光榮的革命歷史」，告誡同志勿忘了國民黨一頁頁茹苦飲痛的奮鬥史。蔣介石並不認為國民黨無心實行民主，不過他提醒：「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有法紀有秩序的民主，而不是無法紀無秩序的陷於無政府狀態的假民主。」對於那些議論民主問題

⁸ 孫科，〈政治民主化，經濟計劃化〉，1944 年 2 月 23 日在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三十期演講，孫科，《孫科文集》，第 3 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頁 1157。

⁹ 同上文，頁 1157-1158。

¹⁰ 《唐縱日記》，1944 年 4 月 13-14 日，25 日，5 月 18 日，頁 424，426，431。

的黨內民主同志，蔣介石要求他們發揚互信和共信，對外言論要格外慎重，「切莫授人以隙，而使本黨革命受了無形的損失」。¹¹

蔣介石習慣以道德性的語言制止國民黨人的內部爭吵。然而孫科的言論並非孤立的個案，他的呼聲在戰後被更多的黨人承繼下來，這顯示蔣先前的道德性勸說無法真正平息黨內浮動的情緒。一些人繼續抨擊稱，黨執政之後，民主集權制就被個人領導所取代，從此，黨的幹部不再透過選舉產生，而是讓黨的上級任命。由於領導階層的推諉卸責、漫不經心，使得黨在縣級以下的基層單位萎縮了，黨的會議徒具形式，黨員消極怠惰。因此，黨沒有社會基礎，甚至在自己的黨員之中也缺乏基礎。¹²

不少黨人認為，只有透過、並實踐他們的呼籲——實行黨內民主——國民黨才能真正鞏固其統治的道德基礎，也才能如蔣介石所期望的使革命免於遭受損失。持有這類立場的黨員相當的普遍，以致在國民黨形象日蹙的局面下，黨內民主似乎在檯面上成了黨人的一種普遍性信仰，甚至在黨的官方文件當中也能見諸這股熱潮。

1945年以降的國民黨全代會與中全會上，民主的原則一再被黨的高級幹部提出，並且體現於多件向外界公開發表的決議案當中。例如1945年國民黨六全大會——一個以抨擊黨的無能腐化而聞名的全代會——對於黨務報告的決議案，便直指黨務的主要缺失，認為「黨內民主」這個環節出了毛病：

年來黨務之主要缺點，在黨的民主精神不足，以致黨與黨員脫節，黨員與民眾脫節，馴至官僚主義侵入革命陣營中。今後各級代表大會必須按時舉行，各級負責幹部必須依法選舉，下級應服從上級之命令，上級亦應重視下級之意見。同時黨內應倡

¹¹ 蔣中正，〈本黨革命歷史的特徵和一貫的信心〉，1944年5月20日出席五屆十二中全會開會講詞，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4），卷20，頁389-393。

¹² Lloyd E.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 Press, 1984), pp. 120-121.

導相互批評，而各級同志亦當互相尊重，以肅清官僚主義之作風，鞏固全黨之團結。¹³

1946年六屆二中全會則對於民主集權制再行闡發。¹⁴至於1947年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的一件決議案，更對黨的頹勢發出最沉痛的警告。三中全會這件措詞嚴厲的〈現階段的黨務方針案〉力言：「黨的病狀，確已陷於積重難返之勢，非一人一事一時一地之改革所能為力。必須從根本上著眼，為全面之更張，大刀闊斧，由外及內，總檢討，大革新。」根據案文的檢討，國民黨「從來重集權而輕民主，重人治而輕法治，重黨部而輕黨員」，這種「畸形風氣」應該徹底改正，此後「一切重大決策，必須通過會議，一切重大用人，應該信任制度。」決議案接著要求黨人，「要以理想改造現實，勿以現實犧牲理想」，「必須肅清官僚主義，發揚革命作風，實行民主作風」。¹⁵（附表）

附表：國民黨在1945年後提及「黨內民主」的決議案（中央層級）相關內容

	案名	相關內容
六全大會 1945.5.19 通過	對於黨務報告之決議案	……一、年來黨務之主要缺點，在黨的民主精神不足，以致黨與黨員脫節，黨員與民眾脫節，馴至官僚主義侵入革命陣營中。今後各級代表大會必須按時舉行，各級負責幹部必須依法選舉，下級應服從上級之命令，上級亦應重視下級之意見。同時黨內應倡導相互批評，而各級同志亦當互相尊重，以肅清官僚主義之作風，鞏固全黨之團結。……

¹³ 〈對於黨務報告之決議案〉，1945年5月19日六全大會通過，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6），頁919。

¹⁴ 〈對於黨務報告之決議案〉，1946年3月15日六屆二中全會通過，《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頁1038-1039。

¹⁵ 〈現階段的黨務方針案〉，1947年3月23日通過，秦孝儀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輯，《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二）》（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79），頁441，444-445。

<p>六屆二中全會 1946.3.15 通過</p>	<p>對於黨務 報告之決 議案</p>	<p>……二、實行民主集權制 (1)各級代表大會，均應照章如期舉行，所有代表必須由選舉產生，不得指派或圈定。 (2)未經選舉而成立之黨部，均應於本年內盡速依法完成選舉，成立正式黨部。 (3)中央重要決策，應先經中央常會商討決定後呈總裁核定。 (4)總裁對重大問題之指示，先交中央常會研議實施。 (5)各級黨部之重要事項，應經各該執行委員會之決議。 (6)上級黨部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有重大決策時，應先徵詢下級黨部之意見；遇有緊急措施未及徵詢時，一經決定，應即通知各級黨部，以達全體黨員。 (7)黨員在黨內有充分發表意見之自由，但一經決議，應絕對服從。 ……</p>
<p>六屆三中全會 1947.3.23 通過</p>	<p>現階段的 黨務方針</p>	<p>……以民主的方法透過合法的組織，造成黨的意志，……厲行選舉制度，人才主義，……黨的工作方式，無論在組織、訓練、宣傳、民運等方面，必須肅清官僚主義，發揚革命作風，厲行民主作風，從來重集權而輕民主，重人治而輕法治，重黨部而輕黨員之畸形風氣，應徹底改正。一切重大決策，必須通過會議，一切重大用人，應該信任制度。注意黨內輿論，積極團結黨員。凡未經會議通過者，不能視為黨的主張。……</p>
<p>六屆四中全會 1947.9.12 通過</p>	<p>中國國民 黨當前組 織綱領</p>	<p>……依據本黨民主集權制之原則，各級領導幹部應由民主之方式選舉，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總裁領導全黨，下級服從上級；各級機構應經常向黨員提出工作報告，黨員應切實檢討工作，坦白互相批評。……</p>

資料來源：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頁 919，1038-1039，1109-1110，1172。

三、官僚主義、官僚資本主義

(一) 官僚主義

抗戰初期，國民黨曾因民族危機而得到社會各階層的支持，但是很快的，這種熱情就已消褪泰半。戰爭後期，國民黨政權無論在精神或是在物質方面，都已處於衰退之局：災難性的通貨膨脹不已；軍隊狀況持續惡化；甚至戰時的政府也面臨如何合理分配稀少經濟資源的特殊問題。由於「官僚主義」盛行，執行者的效率低落，以致到戰爭後期，政府在經濟中的主導作用變成政治上的負債，「官僚資本主義」的譏評不脛而走。¹⁶

在抗戰與國共內戰的年代，「官僚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成了黨內外對於國民黨施政腐化的具體指控。何謂「官僚主義」？其歷史根源為何？一般認為這和中國數千年的官場積習有關。抗戰結束後，一篇刊登在標榜革新的黨員刊物的文章指出，官僚政治的現狀，與中國數千年封建思想的遺風關係至深。作者認為，官僚政治源於官僚主義，官僚主義則起於封建思想，「一切官僚主義，官僚政治，官僚態度，官僚作風，都是以封建思想為出發點」。至於封建遺毒所及，一般官僚的作風是：第一，以個人為中心，形成優越地位，產生個人效忠現象；第二，扶植親屬、同鄉，盤據要津，形成特殊地位與地盤；第三，使官僚及其下屬，形成統治階級，俾支配人民。¹⁷

將戰後官僚政治與中國傳統二者聯繫並賦予因果關係的看法，幾乎是論者一致的意見。這證明官僚政治並非憑空而生，而且官僚政治的存在，也暗喻了國民黨政權仍有其封建性格。不過，揆諸中國歷史

¹⁶ 詳細的討論，見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6), pp. 566-608.

¹⁷ 袁晴暉，〈官僚政治的思想基礎〉，陳中民編，〈官僚政治批判〉（南京：帕米爾書店，1948），頁 27-28。原刊於《革新評論》，第三期，1946 年 12 月 10 日。

的進程，以及迴避不同史觀者對於封建時期的界說所可能帶來的爭議，眾人對於「封建」所能求得的最大公約數認知，顯然指的是中國傳統上的專制，而不是歷史上封疆建藩的特有時期。換言之，封建，意味著一種性格，一種流風，而非一種歷史制度。

戰後抨擊官僚政治與官僚資本不遺餘力的陳人白就認為，中國傳統上的官僚制度形影不離的隨著秦漢君主專制以後的發展而積累，形成一個龐大的機制。民國雖然成立，但先是袁世凱的軍事專政，繼之軍閥的軍事專政，最後則成了一黨的軍事專政，「無須說，在這些專政底下，是絕對少不了官僚制度這一傳統的工具的」。作者認為，現階段官僚制度的階級基礎，已經不只是傳統古老的地主和商人高利貸者，而主要是立足於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上的買辦、銀行家，乃至工業鉅子了，因此歷史上的官僚制度不僅原封不動的承襲了下來，同時也被推到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¹⁸

基於如上的認識，國民黨人對官僚主義的流弊因而指摘甚烈。戰後一名黨內革新派刊物的作者就曾強烈的說道：

官僚腐蝕了今天中國的大小機構。建國理想因之而玷污，行政效率因之而停滯，良法善意因之而變質，人民疾苦因之而加深，革命同志無不知其為今日中國政治混亂經濟凋零主要病源之一，而痛惡深絕；無不省悟此病源若不從根剷除，中國政治，經濟乃至整個國家民族的前途都危險萬分！這決非是危言聳聽。¹⁹

該文作者接著指出官僚存在四種病徵，一、人重於事，二、形重於質，三、情重於法，四、私重於公。這四種觸目可見的官僚病徵，一方面因為植根於中國歷史與社會的土壤中，一方面又因個人主義的逆流滋潤，「所以它的毒菌極易於不知不覺中得入人們的骨髓，化革命志士

¹⁸ 陳人白，〈官僚制度之史的檢討〉，《官僚政治批判》，頁 52，55-56。原刊於《求真雜誌》，第一卷第二期，1946 年 7 月 1 日。

¹⁹ 張靜倫，〈敗壞政治的四種官僚作風〉，《官僚政治批判》，頁 130-131。原刊於《革新》，第二卷第十一期，1946 年 3 月 29 日。

為反革命叛徒」。在這種情況下，作者問道：「中國哪一年才可以步上富強之路！」²⁰

類似的呼聲普遍存在於戰後國民黨人的刊物，以及國民黨的官方文件當中。這意味著黨人對於黨的病狀，顯然具有相當程度的反省共識。戰後由重慶延伸至南京的一項黨政革新運動，曾經以其慷慨激昂的清議式言論，博得時人的目光。該運動成員在 1946 年春天提出的一篇綱領性宣言，猛烈的指摘國民黨已經衰敗，官僚主義就是其中一個絕大的致命傷：「所謂官僚主義之流毒，其隨處可見者，為政府各機關多泄沓因循，虛張粉飾，喪失為理想奮鬥的精神。各級官吏多瞞上欺下，舞弊營私，鮮見有救國救民的報負。無論政府機關或黨務機關，一切措施，更多與人民社會隔離，成為腐敗的衙門，即就各種會議來觀察，亦多重形式主義，鮮見有熱烈的辯論，尊重眾意的民主風氣。」這篇宣言最後祭出哀悼的語氣：

一個本來生機蓬勃的革命黨，到今日只表現著辛苦支持門戶的老年心理，不見有樂觀奔赴前途的青年姿態了！²¹

（二）官僚資本主義

根據 Joseph Fewsmith 的看法，「官僚資本主義」指的是政治職位與社會資源的相互滲透，具有以公共職位獲取私人利益（即假公濟私或化公為私）的一般意涵，但卻比傳統所謂的貪污更嚴重。因為傳統的貪污僅獨厚私人，但官僚資本主義卻把個人的貪污和官僚體制內的派系連在一起，形成制度化，是一種結構性的貪污。²²

關於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起源，戰後不少論者有著「溯古」的解釋傾向。換言之，在官僚資本伴隨官僚政治發生的情況下，兩者同

²⁰ 同前註，頁 131-134。

²¹ 〈我們的呼聲——黨政革新運動〉，陪都座談會編，《中國國民黨黨員黨政革新運動》（重慶：青年軍出版社，1946）。

²²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1995），頁 24。

為古代專制傳統的產物，形之於外者，囤積居奇、高利貸與賤價收買、霸佔兼併、貪污走私等等不一而足。²³不過也有論者提出相異的看法。例如陳人白就認為，以古代中國的初步商業資本，實無可能形成固定的官僚資本；相反的，官僚資本乃是資本主義時代某些落後國家的官僚政治下的產物。²⁴

根據陳人白的論點，中國的官僚資本起於十九世紀中葉外力入侵之時。其理論根據則是：某些落後國家遭受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侵襲，軍事打擊和政治壓迫，被迫興辦某些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以資應付，然而這時，本國資產階級的「原始資本積累」還沒有完成，因此只好以國家名義籌款進行。但國家的行政操於官僚之手，於是以國家名義籌辦的企業，不管是「官辦」或「官商合辦」，官僚總是起著「領導」的作用，因而那些企業也就自然而然的由官僚所掌握。這樣的景況到了一黨專政的時代，特別是抗戰勝利之後，甚至達到了「登峰造極」的歷史「奇觀」。²⁵

中國對日戰爭時期，由於通貨膨脹連同物資短缺而產生的物價飛漲現象，使得戰時統制經濟所派生的專賣、專買、囤積、走私成為利益的淵藪。但根據左派經濟學者王亞南的觀察，官僚勾結金融資本，或官僚資本透過官僚而進行的最有利的發財途徑，似乎在黃金買賣、外匯管理、生產統制等方面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他們利用戰時經濟使國家變為社會的主要消費者、生產者，乃至流通者的機會，在抗戰過程中，「把全國可能『取之盡錙銖』而聚斂起來的資產，囊括為他們的私有物了」。等到戰爭結束，他們那些「大小頭目」，「又很快地利用『劫收』的機會，變成為更大的更實在的官僚資本家」。²⁶

²³ 這種「溯古論」可以參見陳中民編，《官僚資本批判》（南京：帕米爾書店，1948），頁 30-76。

²⁴ 陳人白，〈論官僚資本〉，《官僚資本批判》，頁 10。

²⁵ 同前註，頁 10-11。

²⁶ 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上海：時代文化出版社，1948），頁 300-301。

王亞南的觀察符合不少人對於戰時戰後官僚資本積累的看法。國民黨內素以「大砲」聲名聞世的劉不同就曾乾脆說道：「中國晚近之官僚資本家爲誰？凡由國家銀行低利貸得現款而牟利者是也。凡曾利用權勢集資侵漁，勾結豪富，於戰時獲得鉅利之官吏或黨委者是也。」²⁷陳人白分析戰後官僚資本積累的過程，實際就是「新」官僚資本的特殊走向：

一、以「統制」之名將一切官僚資本集合和集中起來，操縱於極少數的官僚之手；二、把某些民營或半民營的企業完全附屬於官僚資本（如以四小行附屬於四大行），使民營企業也官僚化，以增厚官僚資本的勢力；三、使官僚資本普遍展開到各方面去（如農村的貸款及所謂合作運動等），以期壟斷全國各經濟部門及國民生活；四、企圖將中國的經濟命脈寄託於太平洋彼岸的金元帝國，以便中國對外關係的「單元化」。²⁸

陳人白強調，這種「新官僚資本」的特殊傾向，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空前侵略，使之壓縮到一個落後的場域去發展。但是抗戰勝利後，這種特殊傾向獲得「千載一時」的機會，遂毫無顧忌的大踏步向前邁進了。他對官僚資本主義的橫行深表憂慮：「就我們現時這種新官僚資本所已經達到的可驚程度及其顯著的趨勢看來，即就『它現時差不多已掌握了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扼住了一切民營企業的咽喉』的現狀看來；就『它將蠶食整個國家的僅有財產，摧毀一切民營企業，吸盡一切民脂民膏』的趨勢看來，這不僅僅是在我國官僚資本發展史上的一種空前的『奇觀』，而且也是全世界上一個絕無僅有的怪物！」²⁹

（三）官僚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與黨內民主

²⁷ 劉不同，〈釋官僚資本〉，《官僚資本批判》，頁8。原刊於《民主與統一》，第八卷。

²⁸ 陳人白，〈論官僚資本〉，頁13。

²⁹ 同前註，頁13，16-17。

一般人視「官僚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國民黨施政腐化的兩大具體表徵，兩者具有病態的承接關係（官僚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依照陳人白的話說，就是「官僚資本，既是某種專政下的官僚制度的產物，並依靠它的存在而存在，依靠它的發展而發展的，則這種官僚資本的一切罪惡便是官僚制度及其所依靠的專政本身的罪惡之一種表現。」³⁰職是之故，「官僚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這兩大病徵的解決途徑，實即存在於該承接關係當中。換言之，即如一些地方黨人所稱：「官僚資本為官僚政治的產物，故欲肅清官僚資本，必先打倒官僚政治，使官僚資本，失所憑依。」³¹

進一步說，打倒官僚主義的最佳途徑，則應摧毀它所依靠的專政結構，亦即在政府方面實施民主政治，在黨務方面力行黨內民主。陳人白對此的意見符合一般人的認知，他指出，如要徹底清除官僚主義，首先必須徹底廢除當前的寡頭專政或一黨專政，而以最徹底的民主政制來代替它，屆時官吏們「將自動發揮其服務能力，廉潔精神，來取得社會的榮譽，以此逐步地走上官吏與人民間的界線之廢除。」³²

循著該方向，一名作者呼籲：「我們要肅清官僚主義必先整飭政風」，而首要的治本辦法就是實行民主政治：

官僚政治與民主政治的最大歧異在於用人方式不同，前者是採由上而下之方式，官吏之任命由於統治者之意旨，一切措施只要能得統治者之同意，不必有所顧忌；因此容易形成瞞上欺下，視人民為奴隸，作威作福的官僚習氣；後者係採由下而上之方式，官吏之任命多由人民之選舉，故人民是官吏的主人，官吏是人民的公僕，公僕自然不敢向主人擺架子，使威風，公僕對於主人自然要竭智盡忠為主人謀福利，不敢為自己謀享

³⁰ 陳人白，〈論官僚資本〉，《官僚資本批判》，頁20。原刊於《求真雜誌》，第一卷第六期。

³¹ 劉偉森等，〈如何肅清官僚資本〉，《官僚資本批判》，頁145。原刊於《革新評論》，創刊號。

³² 陳人白，〈官僚制度之史的檢討〉，頁60。

受；否則主人會行使牠【他】的罷免權叫他滾蛋，這樣過去官僚主義下所有的種種毛病，均可一掃而空，所以民主政治是診治官僚主義的一服最有效的消毒劑。³³政 160

由於國民黨係中國政局的主導性政黨，因此，貫徹民主政治一節仍應落實在黨內的人事機制裡頭，以求一體貫徹。戰後坊間一本談論黨派內幕的書籍替國民黨建言指出，爲了要加強黨員與黨員的聯繫，「就必須實行黨內民主」，採取絕對民主的選舉制度，然後「黨才有新陳代謝的作用，黨的新興人物才能不斷產生，過去少數人包辦政策自然可以徹底根除」。³⁴戰後參與革新運動的黃宇人則生動的描繪出某些高層官僚的政治性格，認爲黨內民主勢在必行：

我們認爲唯有恢復黨的民主制度，黨是國是才可望依照大家的公意以行，而使一些官僚政客無法再作「走私」的勾當。「走私」一詞，可說是我當時所發明的，因為這些官僚政客在各種正式會議中，絕少公開的有所主張。他們只是利用與蔣校長接近的關係，隨時向他告密，並相機進言，然後挾他的手諭或面諭以凌人。因此，多數人經過長時間討論所決議的事，往往被他們在他之前片言推翻。國民黨所以日趨衰敗，大半即緣於此。³⁵

緣於這種看法，儘管革新運動陣營呼籲「肅清官僚主義，實行民主政治」、「打倒官僚資本，實行民生主義」，但是爲確保這些政見能夠遂行，他們認爲最重要的，還是首需注意「團結革命同志，實行黨內民主」。職是之故，「實行黨內民主」便成爲戰後那些抨擊官僚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最烈的革新分子的優先訴求。³⁶然而，我們不能輕率的認

³³ 鍾志鵬，〈肅清官僚主義與整飭政風〉，《官僚政治批判》，頁 160。原刊於《革新評論》，第二、三期合刊。

³⁴ 江漢鐘編著，《中國黨派內幕》（出版地不詳：新中國出版社，1946），頁 39。

³⁵ 黃宇人，《我的小故事》，下冊（香港：吳興記書報社，1982），頁 15。

³⁶ 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1938-1949）》（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8），頁 240。以下簡稱《黨團關係研究》。

定國民黨人爭取黨內民主之舉純係出於昇華性的理想，恰恰相反，現實面的動機可能要大過前者，此即下節即將談到的黨內派系政治的糾葛。

四、戰後派系政治與黨內民主

抗戰期間國民黨政權內部派系傾軋嚴重，許多人認為蔣介石蓄意鼓勵黨內派系惡鬥的發展。對此，研究戰時中國政治的齊錫生謹慎的指出，蔣在這方面的角色仍不清楚，不過齊錫生試圖對派系氾濫的情況提出結構性的解釋觀點。齊錫生認為戰時國民黨派系主義的盛行，意味著黨政高層人物與地方領袖相較，政軍權力相形降低的反映；也是如下現象的表現——難能將黨的控制力擴及一般群眾、缺少黨正規成長的前景，以及企圖攫取日益縮減中的政治大餅之最大部分的心理反映。³⁷

依照齊錫生的論點，抗戰期間中國的國家機器重心局促西南一隅，政治資源相對減少，政治競爭者的活動領域基本上被侷限於中央的層面，和還未被地方實力派爭先攘奪到的少數省份及地方。政治鬥爭在這種資源緊縮的情況下變得更加尖銳，犬儒主義（cynicism）也迅速籠罩在黨內的派系政治當中，嘲諷與指責動輒可見。³⁸「恐怖平衡」的無形機制隨時都在運作著。習見的情況是，當某一派系破壞或可能破壞該機制，以致出現獨大或躍居優勢的傾向時，往往就得面臨其他派系的聯合對抗，或是蔣介石的刻意介入，以便維持均勢的狀態。

國民黨自 1924 年改組以降的歷史顯示，失勢派系或弱勢派系爭取本身權益的慣用手法，多半就是倡言黨內民主。這些派系相信，在

³⁷ Hsi-sheng 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Ann Arbor: The Univ. of Michigan Press, 1982), pp. 205-206.

³⁸ 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 207.

公平競爭的黨內環境之下，藉由幾個失勢派系結成聯合陣營的方式，將能有效遏制某一優勢派系的繼續膨脹。在這樣的工具性思維之下，所醞釀產生的派系運動並不少見，例如 1946 年，CC 系聯合同屬黨內右翼，但相處向欠融洽的黃復青勢力，針對政學系、孔宋豪門的作為，施加幾近全面的抨擊，即所謂黨政革新運動。

隨著對日抗戰的前景呈現樂觀的傾向，國民黨各派系的最佳戰術原本是當勝利來臨時，把自己巧妙的放在割取勝利果實的位置上。³⁹但是政學系在抗戰後期至戰後初期的政治勢力的擴張，卻破壞了這種算盤。再者，就黨內某些人士看來，善於觀測政治風向、行事圓滑現實的政學系，才應該對黨內「官僚政治」的流弊負起最大的責任。不料，隨著戰後政局演變，蔣介石對政學系的倚賴不減反增。在應付中共與蘇聯的相關立場上，特別是在政治協商會議中所通過的五五憲法草案修正案與國民大會無形化等問題上，政學系人物一意「妥協」的結果，在在都使得 CC、黃復青等黨內右翼勢力相信：國民黨與國家的主權、尊嚴，正冒著逐步流失的極大風險。⁴⁰

這股帶有濃厚清議色彩的黨內輿論，可以用政治學者的「依持主義」(clientelism) 理論來解釋其產生的現實背景。所謂的依持主義，指的是以「恩庇／依隨之二元聯盟關係」(patron-client dyadic alliance) 完成對政治社會體制的動員與控制，派系政治即為其中的具體表現。依持主義通常存在於不對等的權力與地位的行動者之間，其中的「恩庇者」(patrons) 具有較高的權力地位，「依隨者」(clients) 透過對恩庇者的效忠，換取資源。但依隨者通常也擁有恩庇者所缺乏或需要的資源，因此雙方很有可能建立一種互惠性質的交換關係。⁴¹

³⁹ 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 207.

⁴⁰ 王良卿，〈黨團關係研究〉，頁 240；林能士，〈國民黨內派系之爭與國共商談——以《王世杰日記》為中心的探討〉，《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台北：中國近代史學會／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1996），頁 920-938。

⁴¹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頁 7-8。

不過揆諸戰後時局，CC、黃埔等作為美國官方眼中的保守、頑固的國民黨右翼派系，似乎不可能，至少，也是不便成為蔣介石處理黨派談判與若干外交問題的檯面政策代理人。從這個角度而言，蔣介石（「恩庇者」）和 CC 等派系（「依隨者」）之間的關係，在某些方面，例如依恃主義內含的兩造利益交換原則，確曾在戰後初期一度遭受破壞。

在黨內右翼分子的眼中，從前以宗奉蔣的領袖地位為前提所鋪展的國民黨派系均勢，刻正失去平衡。這可能正是有利於黨內清議滋長、失勢與弱勢派系結合的現實背景。此外，黨內幹部對國民黨政權的統治頹象同樣深感焦慮，以孔祥熙、宋子文為首要指涉對象的「官僚資本主義」也成為黨內、甚至黨外群起指責的目標。就在國民黨內部普遍交織著上述不滿情緒與派系成見的情況下，包含 CC 系、黃復青在內的幾個右翼派系，旋即在 1946 年春天發起一場黨政革新運動，強烈要求憑藉姻親關係而起的政治豪門（孔宋），與所謂夤緣倖進的官僚（政學系人物），必須對黨的形象、權力基礎的流失承擔起責任。⁴²

根據革新集團內部較為通行的看法，國民黨的一切失敗，均由於不民主。為了防杜官僚政客透過蔣介石的管道再行「政治走私」，並保證革新集團的政見能夠順利實行，革新集團認為首需注意「團結革命同志，實行黨內民主」。⁴³在革新集團公開政見的兩天後，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開幕，這也就成了革新分子宣洩不滿、抒發政治立場的最佳場合。

參與革新運動的成員對戰後初期蔣獨寄厚愛於少數人物，多表不然。一位運動成員即坦言，其實「大家的心理是不滿意總裁而向總裁要民主的」。⁴⁴二中全會會議期間，政學系要員盡成怨望所集。行政院

⁴² 王良卿，《黨團關係研究》，頁 234。

⁴³ 參見：〈我們的呼聲——黨政革新運動〉，陪都座談會編，《中國國民黨黨員黨政革新運動》，頁 6；《唐縱日記》，1946 年 2 月 8 日，頁 588；黃宇人，《我的小故事》，下冊，頁 15。

⁴⁴ 《唐縱日記》，1946 年 3 月 3 日，頁 595-596。

長宋子文則繼孔祥熙之後，被視為官僚資本主義的又一化身。來自黨內同志的攻擊，形同對於蔣介石威權的挑戰，因為無論是各項政治事務或是最近的政協決議，蔣仍是那些被抨擊者最終所依恃的權力來源。⁴⁵在3月11日的會場上，蔣介石對黨人跡近瘋狂的鬥爭行為公開表達痛心，但在兩天後，可能為了尋求某種妥協，例如要求二中全会對政協決議給予背書，蔣介石答應革新集團所堅持的：黨的中央常務委員經由開放式票選產生。⁴⁶

自1942年五屆十中全會之後，國民黨中常委的產生方式，雖有記名選舉之實，但透過蔣介石的預提候選名單，實則仍是總裁個人意志的表現。⁴⁷現在，伴隨著六屆二中全会裡高漲的革新聲勢，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首次得以其個人意志，以無記名方式選出他們屬意的常務委員。選舉結果，親炙CC系、或和其採取合作立場的多名革新運動骨幹均告當選。就中全會新選出的三十六名中常委名單分析，CC系佔了十二名，黃復青佔六名，兩派合計，恰佔中常委半數；⁴⁸另外如果加上其他親革新運動的派外人士，包括抗戰之前具有反蔣經歷的朱霽青、白雲梯、梁寒操等人，那麼革新陣營事實上已取得極重大的成果（附圖）。

⁴⁵ 王良卿，《黨團關係研究》，頁240，242。

⁴⁶ 《唐縱日記》，1946年3月10日，頁598；《王世杰日記》，第5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1946年3月13日，頁285-286。

⁴⁷ 參見〈改推常務委員案〉，1939年11月20日五屆六中全會通過，與〈改選常務委員案〉，1942年11月27日五屆十中全會通過，均見《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頁606，804-805；李雲漢主編，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職名錄》（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94），頁136-137；《王世杰日記》，第4冊，1944年5月24日，頁318-319；黃宇人，《我的小故事》，下冊，頁15。

⁴⁸ CC系包括：陳果夫、陳立夫、谷正綱、張道藩、張厲生、段錫朋、潘公展、蕭同茲、賴璉、田崑山、蕭錚，以及親CC的陳布雷。黃復青勢力為：陳誠、賀衷寒、張治中、劉健群、鄧文儀、柳克述。

附圖：1946年新選出的國民黨中常委派系比例略圖



雖然革新集團提出的主張仍舊擁有可觀的火力，但在 1947 年的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之後，這項運動卻消褪了。研究革新運動的易勞逸對此提出若干解釋，其中包括蔣介石並未積極支持該運動。然而 CC 系與黃復青勢力之間難能共謀的敵意，恐怕才是革新運動沉寂的主要原因。⁴⁹例如 1947 年以三分之一名額為度的常務委員改選，由於 CC 系與非 CC 系之間搶奪席次的緣故，使得革新集團先前以派系利益相糾合的脆弱基礎暴露無遺。⁵⁰CC 系與黃復青勢力的合作關係只是短暫而又片面的，這使得黨內民主無法在擺脫派系成見的環境下，獲得無私推行的機會，遑論鞏固其到手的成果。

職是之故，在國民黨謀求自救的 1940 年代，「派系政治」往往成為國民黨改革努力下的一塊絆腳石——儘管主張改革的派系中人也信誓旦旦的宣稱以移開這塊絆腳石為職志，但是人們發現，他們不過是想將這塊石頭搬到黨內政敵的腳下去罷了。例如 1948 年黨務座談會中一份跨派系的提案，指出北伐完成後，國民黨黨務逐漸被少數人所

⁴⁹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125. 參見王良卿，《黨團關係研究》，頁 244。

⁵⁰ 羅久芳註記，邵銘煌校讀，〈羅家倫先生日記——民國三十六年至三十九年〉，《近代中國》，第 131 期（台北：民國 88 年 6 月），1947 年 3 月 24 日，頁 153。三中全會依二中全会決定中央常務委員三十六人，每次全會改選三分之一。

把持，此少數人爲求鞏固其在黨內之地位，捨民主而取集權，一切由上而下，以委派代替選舉，以命令變更決議，頤指氣使，視黨部若官衙，目同志爲僚屬，影響所及，不僅黨的民主傳統爲之一空，「黨內有派」的現象也隨之產生。案文指出：

黨內有派別，而黨又無健全之民主制度以衡制之，結果遂使此少數人所形成之派別，在黨內盤據廿餘年，而多數人莫如之何，此誠世界各國政黨史上未有之現象。由於此少數人之盤據，使整個的黨受其扼制，上下不通，內外隔絕，本黨新陳代謝之生機，由此斷絕，而黨遂從此日趨於腐敗，而莫能自拔。⁵¹

案文指控的「少數人」究係何指？從後文陳述這些「少數人」提倡的是一套所謂「本位文化」的復古思想來判斷，明顯指的是戰後初期祭出「黨內民主」口號的 CC 系。⁵²富有強烈對比意味的是，提案成員背後所代表的派系勢力，倒也曾在不久前的革新運動當中，附和 CC 系爭取黨內民主的主張呢。

五、黨內民主與蔣介石的地位

戰後黨內民主的呼聲日高，其實還含有派系企圖分削、分攬總裁重權的意味在內。就理論面來看，當黨內民主的呼聲發展到最後，位居權力頂端的蔣介石，勢必成爲「改革者」遲早所要面對的對象。另就實際面而言，如果早在改革伊始，藉由黨內民主的推行，對總裁的領導威權給予適度限制，那麼優勢派系就有可能更早失去他們所仰仗的權力來源，至少，不易憑恃。

⁵¹ 許孝炎等四十五人擬，《改造本黨意見書》，頁 1-2，南京二檔藏，711(4)/355。

⁵² 同上註，頁 2。

事實上，如果不過分誇大蔣介石的權謀意圖，那麼根據文獻顯示，蔣面對失控的黨內派系政治所能做出的選擇，往往是設法開放更多的政治利益以資安撫，並將各派系的整體實力維持在一定的比例與部門之中。但蔣的做法往往不為派系中人所諒，認係多手策略，這自然嚴重損及蔣作為黨政軍最高領導人的道德形象。⁵³

基於「不滿意總裁」的心理，革新集團要求修補倒持已久的中常會職權，俾便限制蔣介石動輒繞過中常會以行使領導權的做法。⁵⁴在1946年的六屆二中全會裡，革新派成員掀起氣勢高漲的清議聲浪，使得蔣介石傷透腦筋，這就便於讓革新集團同時間提出的黨內民主，贏得了若干討價還價的空間。⁵⁵最終，如前所述，革新陣營成員向蔣爭得中央執行委員自由選舉中常委的權利；接著大會在革新派的影響下，通過決議：「中央重要決策，應先經中央常會商討決定後呈總裁核定。」「總裁對重大問題之指示，先交中央常會研議實施。」⁵⁶

值得一提的是，隨著黨內政敵消除，以及抗戰軍興以來的實際需要，蔣介石的權力不論在形式上或事務上，確是日漸集中，但在實質上，根據僚屬唐縱的觀察，蔣的權力卻有日漸降低的傾向。⁵⁷首先，就國民黨派系政治而言，蔣介石的任何介入、指揮與仲裁，勢必都難以周全的滿足眾望，結果只會讓他原本應有的超然地位愈加傾斜，而不可能如其所願的更加鞏固。再者，「不滿意總裁」的心理，直接衝擊了黨人對於蔣的服從習慣。至少，也是衝擊了服從蔣的由衷程度。

⁵³ 王良卿，〈派系政治與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第六屆中央執行、監察委員選舉為中心的探討〉，《國史館館刊》，復刊第二十一期（台北：1996年12月），頁150。

⁵⁴ 黃宇人，《我的小故事》，下冊，頁15。

⁵⁵ 參見《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速紀錄》，1946年，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藏。

⁵⁶ 〈對於黨務報告之決議案〉，1946年3月15日六屆二中全會通過，《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頁1038。

⁵⁷ 《唐縱日記》，1944年5月7日，頁429。

觀察若干國民黨高級幹部的日記等文獻，可以大致獲得一個印象：黨人私下針對蔣介石的領導風格——諸如事必躬親、條子文化、越級指揮，以及若干用人作風與知人能力等等，往往不敢苟同，有時還會流露出犬儒式的譏嘲、批評，這些都在侵蝕了蔣介石的道德形象基礎。⁵⁸因此，戰後爭取黨內民主的呼聲日高，實則與蔣介石統治的道德性基礎鬆動有關。

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人私下稱蔣介石為「老頭子」一詞，就顯然不是什麼親暱的稱謂，而是一種黨內犬儒文化的產物。黨人私下對於蔣介石領導風格的一再奚落，隱然已成為黨內的不宣之秘。但是敢於「公開」批評蔣的黨人，往往卻又必須面對其他黨內同志「公開」的言語圍剿，這就又具體呈現了國民黨另一種「檯面上」與「檯面下」的兩面幽微文化。例如 1948 年夏天，以強烈標舉改革而獲「大砲」之名的立法委員劉不同，因為批蔣而引發黨內輿論的壓力，他公開反擊說：「我所說的話，早已為人所說過，不過他們是偷著說，而我是公開地說罷了。」劉不同並且提出質疑：

我很奇怪現在有些人，一方面喊民主，一方面又講盲目地絕對服從。這種雙重人格的態度，或許是內心一種說不出的痛苦。自己的良知既為私慾所蔽而有了矛盾的行為，那又何必勉強其有良知者來唱同調呢？⁵⁹

事實上，國民黨內仍不乏異議分子。在國共內戰方熾、黨務欲振乏力的危局當中，一些激進的國民黨人甚至開始正視行之有年的總裁制度，認係黨務滯塞的癥結。這類的見解雖然無法形成一場真正的運動，就如同沒有多少人敢肯公開指正蔣的領導風格，只能徒寄耳語一樣；不過，最遲在 1948 年，國民黨的會議中已響起檢討總裁制存廢的聲音。

⁵⁸ 參見《唐縱日記》，1942 年 11 月 9、25 日，1944 年 8 月 15 日，11 月 24 日，頁 318，322，451，474；雷震，《第一個十年——雷震日記》，第 1 冊（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89），1948 年 11 月 1、6 日，頁 88，92，以下簡稱《雷震日記》。

⁵⁹ 劉不同，〈我的答覆〉，香港《星島日報》，1948 年 7 月 24 日。

在 1948 年 8 月 3、4 日於南京舉行的黨務座談會中，國民黨籍政治菁英激昂的再提出多年來人們對於國民黨的一切指摘：派系主義、黨與民眾、黨員嚴重脫節、背離民生主義、貪污腐化……等等。⁶⁰其中，「黨內民主」的訴求再一次被多位與會者提出。前三青團中央團部機關刊物主辦人楊玉清，甚至要求國民黨取消實行十年的總裁制度。這名具有立法委員身份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沉痛的指陳國民黨一再所宣稱的民主集權制，實際上只造就了集權，而無民主。楊的口頭發言裡，籲請國民黨重新省視造成上述後果的總裁制度與總裁作風，否則勢難解決其餘的黨務問題。⁶¹

楊玉清的發言成為首日會議桌下的熱門話題。次日，武和軒的發言力度更有過之。這名前改組派幹部認為，民主集權制，就不免有法西斯蒂（fascisti）之嫌。在上者動輒下條子，左右則處處宣稱奉總裁之命，以致造成今天非改革不可之局面。武和軒決然的說，既民主就不能集權，既集權就不能民主，「兩天來，每天都有人指摘這個人，指摘那個人，可是卻很少人把我們的總裁也拿出來檢討一下，其實，整個黨的問題，就是一個總裁制的問題。」⁶²

六、兩黨論與威權重建

蔣介石的總裁地位始於 1938 年。在此之前，這位以「軍權」起家的國民黨領袖一直經歷黨內政敵的各式反對行動。在蔣確立黨的最高領導人的身分之前，他對國民黨抱持何種觀感？事實上，蔣介石的

⁶⁰ 參見吳鐵城，〈報告黨務座談會第一、二日開會情形及各同志意見〉，1948 年 8 月，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藏，特交檔，卷 12。

⁶¹ 鄭一禾，〈國民黨怎樣革新〉、羅伯特，〈旁聽國民黨檢討黨務〉，均見《新聞天地》，第 46 期（上海：1948 年 8 月 16 日），頁 1，4。

⁶² 鄭一禾，〈國民黨怎樣革新〉、羅伯特，〈旁聽國民黨檢討黨務〉，頁 1，4。

崛起過程當中「並不完全」倚靠黨權——儘管他也曾費力經營與爭取；在中國「權隨人轉」的傳統以及國難當頭的當下，蔣介石的地位主要還是仰賴其牢固的軍權，以此取得黨的發言地位。這位軍事領袖與國民黨之間的依存關係似乎還不像若干政敵——例如胡漢民——與黨的依存度來得不可撼動。論者必須審視這種特殊關係才能理解，1932年由蔣扶植成立的復興社爲什麼和國民黨之間有著平行競爭與垂直涉入的歷史。

1935年華北事變之後，《何梅協定》裡出現日方要求解散北平、天津的國民黨黨部等字眼。日方認爲既然可以取消平、津的國民黨黨部，也就可以取消國民黨在全中國的統治，乃力圖擴大事態。日方的意圖與中國國內鼓吹憲政價值的部分言論合流，南京、上海等地的輿論趁勢而起，章士釗呼籲取消國民黨，並起草宣言。論者甚至認爲，這股政治暗潮與蔣介石幕後操縱有關，其目的在於壯大親蔣的復興社，以鞏固蔣的個人地位。⁶³

解散國民黨的要求並未成爲事實，不過蔣介石對於黨的積弱仍頗有微詞。1938年夏天，甫獲推選爲國民黨總裁的蔣介石，初步提出「改造」的想法，指出「如有必要，寧使目前將黨部停閉，從新改造」。⁶⁴事實上，蔣的想法只停留在牢騷階段，反倒是三青團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一般認爲，這個由復興社成員掌控的組織將是蔣介石拋棄國民黨的羈絆，用以吸收青年的新生集團。

然而三青團與國民黨自始至終存在著緊張的競爭與鬥爭關係。由於雙方體制隸屬問題劃分不清，具有自主意識的三青團團員乃在戰後因應憲政潮流，發起了聲勢浩大的組黨運動，究其實，就是將三青團換個真正的黨名，落實其自主性格，俾和頹唐的國民黨進行政黨競爭。然而由於國民黨的反彈，蔣介石以個人威權平息了這場戰後初期最有

⁶³ 郭緒印主編，《國民黨派系鬥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頁98-99。

⁶⁴ 阮毅成，《民國二十七年武漢半年日記（下）》，《傳記文學》，第四十三卷第三期（台北：1983年9月），頁56；蔣介石，《救國必須救黨》、《革新黨務鞏固黨基》，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十五，頁270-281，287-292。

可能成真的兩黨論運動；不久，國共對峙情勢急劇變化，為整合黨的力量，蔣把三青團併入國民黨，即 1947 年的黨團統一。

研究國民黨在台灣實施改造的學者時常忽略，其實早在 1947 年，黨團統一就被蔣介石視為一次真正的改造，蔣並將之與 1924 年的改組相提並論，顯見改革的企圖。但黨與團之間的門戶之見，抵銷了改革的預期效果，而這種結局已是不少政局中人所能料想得到的。例如黨團統一期間，南京《中央日報》社論稱「國民黨必須自救才能救國」，⁶⁵團方喉舌《和平日報》則撰文指出：

黨的改造就是革命的措施，要是不採取大刀闊斧的革命手段，要是對本身的缺點還想掩飾，要是眼光還是那樣狹小，心裡還有彼此的觀念，黨的改造就會失敗，過去五十年革命的光榮歷史也要從此斷送。今天大敵當前，假使黨失敗了，任何黨員都絕對不會成功，大家需要徹底覺悟，痛切反省。⁶⁶

由於三青團以其自主性格逐漸發展出政治集團的實質走向，因此先前的組黨風波曾經成為戰後兩黨論的重大標記。然而隨著組黨風潮的中挫以及隨後的黨團統一，由國民黨政權內部自發的兩黨論議論暫時中止。1948 年，隨著中共軍事攻勢轉為主動，國民黨政權政經表現不孚眾望之際，兩黨論再度浮上中國的政治檯面。

1948 年初，以自由主義為核心的討論逐漸在報端形成，為美國與胡適等意見領袖所樂見。一些學者與官員在北平成立「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傳有成為政黨的可能。這些總括「自由主義運動」之名的言論與組織，主張民主的多黨競爭制度，反對任何形式的一黨專政。⁶⁷人們普遍注視著北方知識分子的動態，而在南方的國民黨方面，一些黨的高級幹部也和北方的自由主義者一樣，正在策劃相似的組黨行動；他們甚至要求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希望蔣介石所尊敬的這位

⁶⁵ 南京《中央日報》，1947 年 9 月 7 日，社論。

⁶⁶ 南京《和平日報》，1947 年 9 月 9 日，社論。

⁶⁷ 參見《大公報》，1948 年 1 月 8 日，2 月 7 日的社評。3 月 1 日，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成立於北平。

學者外交官，能夠代他們求取蔣介石在組黨意向方面的支持。⁶⁸如此一來，無論在黨外或是黨內，組黨的聲音再度響起。

這次的組黨論與一年多以前的三青團組黨風潮有同有異。同者，兩者皆以建立兩黨政治為目標；異者，美國在 1948 年組黨論的涉入程度，顯然要比一年多前由黃復青等右翼勢力鼓弄的兩黨論來得有興趣且深入的多。至於蔣介石對本次組黨風潮的立場如何？曾經蔣敦促參選總統的胡適，在其日記透露蔣這時邀其出面組黨的訊息，不過胡適顯然對此意願缺缺，他並建議蔣，國民黨「最好分化成兩三個政黨」。

⁶⁹

根據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報導，去年蔣介石已著手了解美國的兩黨制度。可見蔣在平息 1946 年廬山的組黨熱潮之後，並未放棄對於兩黨制的探索——不管這是否出於故作姿態。⁷⁰在 1948 年春夏之間，一些國民黨人開始發現蔣對組黨立場問題有所鬆動。在黨內的一些集會裡，蔣不時會情緒性的表示讓底下人出去組黨，而讓這些高級幹部驚訝的是，蔣的這類言語有時倒是用平和的語氣說出的。⁷¹

顯然高層的風向有所轉變，國民黨各派系敏銳的偵測到此一趨勢。前三青團分子在中央黨部裡的重要據點——中央青年部——集會，他們認為國民黨應即改造，團方則不妨重拾廬山被擱置的組黨計劃予以實現。至於政學系方面，由於欠缺下層基礎，因此有必要在組黨問題上採取結盟手段。在這一點，政學系的精神領袖張群與團方一些改革色彩鮮明的人士粗有共識。⁷²至於 CC 系主導的國民黨機關報南

⁶⁸ Kenneth W. Rea and John C. Brewer eds.,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1946-1949*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1), pp. 191-192.

⁶⁹ 胡適，《胡適的日記》，第 16 冊（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1948 年 4 月 8 日。

⁷⁰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 127.

⁷¹ 黃杰，《中央軍官訓練團工作紀要》（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4），1948 年 5 月 30 日，頁 415-416；新加坡《南僑日報》，1948 年 7 月 14 日。

⁷² 劉先雲口述，《劉先雲先生訪談錄》（台北：國史館，1995），頁 173；雷震，《雷震日記》，第 1 冊，1948 年 8 月 10 日，頁 37。

京《中央日報》則公開主張，中國國民黨的黨員，未嘗不可結為不同的集團：

今日本黨的改造，第一要樹立一個原則。這一原則包含著理想和實現理想的政策。換句話說，黨的改造要以理想和政策為主。凡追求同一理想，而主張同一政策的同志，即可團結於同一集團。理想不必強同，政策不求一致，儘管同為中國國民黨的黨員，未嘗不可隨其理想與政策之不同，而結為不同的集團，各申訴其理想與政策於人民，以決其成敗。讓最後成功歸於最後的努力者。⁷³

事實上，國民黨內高層這時已經將「黨務組織的一元化或二元化」排上會議桌討論。8月黨務座談會結束後，黨的中央秘書長吳鐵城歸納出會議的發言要點，「國民黨分為兩黨」是其中一個重要方向。接著，這個方向被具體呈現在中常會小組所研議的黨務改革方案當中，成為國民黨面對未來的幾個選項之一。⁷⁴根據這個趨勢以及黨內人士的刻意放話，外電聲稱，國民黨很可能在年底以前分裂成以陳立夫為首的保守黨派，與以張群為首的進步黨派。消息來源似乎認為兩黨論已經是國民黨內——包括蔣介石在內——的高度共識，根據這名未透露姓名的消息來源的說法，蔣介石將以國家領袖的地位，成為兩黨的聯繫象徵。⁷⁵

由於1948、1949年之間的三大會戰以及急速惡化的政經局勢，蔣介石同時受困於下野壓力，暫無餘裕顧及所謂改革。在這個情況下，兩黨論似已不合時宜，國內政治環境也無從提供有效的實驗空間。1948年12月30日，國民黨中常會上提出的一份辦法，排除了前此黨人林林總總的獻策。辦法建議國民黨另行設立一個戰鬥委員會，由中常會

⁷³ 南京《中央日報》，1948年7月10日，社論。

⁷⁴ 〈總裁批吳鐵城為黨務座談會改進黨務意見處理辦法簽呈〉，1948年8月9日，黨史會藏，138/251；《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記錄彙編》，1954年，頁722-723，753-754。以下簡稱《六屆中常會紀錄》。

⁷⁵ 上海《字林西報》，1948年8月27日。

授權辦理黨的全盤組織作戰事宜。至於喧騰多時的兩黨論，辦法並未提及，不過內文倒是明白的反對黨的「分裂」。1948年的兩黨論就此暫時打住，然而這個戰鬥案卻也隨著1949年國民黨的崩潰而胎死腹中。⁷⁶在蔣介石的主導之下，另一套改革方案正在成形，方案具有濃厚的清洗色彩，並帶有1938年蔣介石所稱「黨部停閉」的構想。這個案子從廣州被帶到了台北，經過修改後的案文所流露出的威權企圖愈顯濃厚，例如執行改革的新設機關——中央改造委員會——其委員由蔣挑選，他們直接對蔣負責；至於中央執監委員會則根本喪失了1945年六全大會交付給他們的職權。

5

七、結語

任何披閱國民黨官方文獻的人都可以發現，國民黨人面對1940年代黨國頹危時局之際，並非束手無策，毫無作為。相反的，眾多黨人曾經以高度理想的言論，指摘黨在執政以來所犯的諸多毛病。這些自救言論的廣度與深度，足以使那個國民黨瀕臨潰敗的時代——1940年代——換之以「自救的年代」之名詞而無愧。在這些林林總總的自救言論當中，爭取黨內民主之舉無疑站在一個關鍵的救亡地位上。

黨人聲稱，從1928年開始，「個人領導」取代黨既有的民主集權制，從此，黨的幹部不再透過選舉產生，而是讓上一級任命。由於這些不用接受黨的民意監督的幹部們欠缺責任心，黨的基層組織開始萎縮，形式主義瀰漫，下層黨員變得消極怠惰，甚至拋棄了黨。這樣的執政黨，不僅在社會上沒有基礎，甚至在自己的黨員之間也缺乏基礎。⁷⁷由於黨的民主機制出了問題，在無從建立責任政治的規範下，黨的

⁷⁶ 《六屆中常會紀錄》，頁753-756。

⁷⁷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p. 120-121.

官僚習氣開始蔓延，官僚資本主義從中依附而生，派系、小圈圈則成爲營私者的最佳保護傘。

由於這些言論鏗鏘有力，直指問題核心，很自然就成了改革者的共識。也因爲倡導者衆，使得戰後四年爭取黨內民主之舉，儼然具有無上的理想光環，而「似乎」不是某些特殊利益者的武器。另一方面，這些言論也連帶抨擊民主不足所派生的種種惡果——諸如官僚政治、官僚資本主義、派系政治、威權領導等等，因此更使得黨內民主的呼聲站在救亡言論的中心點上，從而建立起充分的改革必要性與道德性。

但誠如本計畫所發現的，爭取黨內民主之舉也是黨內政治資源分配不公的產物，換言之，有關黨內民主的呼聲及其連帶的揭弊言論，其背後蘊含了大量的現實糾葛與利益爭執。從這個面向著眼，原先帶有理想層面與道德性格的民主呼聲，反而同時也具備了利益層面與侷限性格，其結果，也就連帶降低了「黨內民主」作爲一種價值信仰的純粹本質，更不用說希望能博取蔣介石（黨人索求黨內民主的對象）的同情與支持了。

國民黨人的改革浪潮起於危難之際，但是救亡言論背後工具性傾向，對消了黨人原想達到的救亡願望；同時由於這種私利意味濃厚的工具性傾向惡化了黨的派系暗鬥，使得 1940 年代終究只能是個國民黨人「自救的年代」，而無法成爲「自救成功的年代」。國民黨遷台後所實施的黨務改造，威權色彩濃厚，蔣介石將他在 1938 年提出的「黨部停閉」概念落實到台灣的改造運動當中，這反映出「革命」終究壓倒了「民主」。1940 年代國民黨人的自救努力以「黨內民主」的訴求肇端，反而以「威權重建」告終，不是沒有原因的。

參考書目

一、檔案與史料彙編：

- 〈總裁批吳鐵城為黨務座談會改進黨務意見處理辦法簽呈〉，1948年8月9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藏，138/251。
- 〈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記錄彙編〉，1954年，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藏。
- 〈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速紀錄〉，1946年，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藏。
- 〈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紀錄〉，1938年，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藏。
- 吳鐵城，〈報告黨務座談會第一、二日開會情形及各同志意見〉，1948年8月，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藏，特交檔，卷12。
- 許孝炎等四十五人擬，〈改造本黨意見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711(4)/355。
- 秦孝儀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輯，〈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二)〉(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79)。
- 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6)。
- 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1992)。
-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5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 阮毅成，〈民國二十七年武漢半年日記(下)〉，〈傳記文學〉，第四十三卷第三期(台北：1983年9月)。
- 胡適，〈胡適的日記〉，第16冊(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

- 雷震，〈第一個十年——雷震日記〉，第 1 冊（台北：桂冠出版公司，1989）。
- 羅久芳註記，邵銘煌校讀，〈羅家倫先生日記——民國三十六年至三十九年〉，《近代中國》，第 131 期（台北：1999 年 6 月）。

二、專著與專文：

- 王良卿，〈派系政治與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第六屆中央執行、監察委員選舉為中心的探討〉，《國史館館刊》，復刊第二十一期（台北：1996 年 12 月）。
- 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1938-1949）〉（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8）。
- 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上海：時代文化出版社，1948）。
- 江漢鐘編著，〈中國黨派內幕〉（出版地不詳：新中國出版社，1946）。
-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共五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94）。
- 李雲漢主編，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職名錄〉（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94）。
- 林能士，〈國民黨內派系之爭與國共商談——以《王世杰日記》為中心的探討〉，《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台北：中國近代史學會／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1996）。
- 孫科，〈孫科文集〉，第 3 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
-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20（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4）。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
- 郭緒印主編，〈國民黨派系鬥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 陪都座談會編，〈中國國民黨黨員黨政革新運動〉（重慶：青年軍出版社，1946）。
- 陳中民編，〈官僚政治批判〉（帕米爾書店，1948）。
- 陳中民編，〈官僚資本批判〉（帕米爾書店，1948）。
-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1995）。
- 黃宇人，〈我的小故事〉，下冊（香港：吳興記書報社，1982）。
- 黃杰，〈中央軍官訓練團工作紀要〉（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4）。

- 劉先雲口述，《劉先雲先生訪談錄》（台北：國史館，1995）。
- 鄭一禾，〈國民黨怎樣革新〉，《新聞天地》，第46期（上海：1948年8月16日）。
- 羅伯特，〈旁聽國民黨檢討黨務〉，《新聞天地》，第46期（上海：1948年8月16日）。

三、報紙：

- 上海《字林西報》。
- 天津《大公報》。
- 南京《中央日報》。
- 南京《和平日報》。
- 香港《星島日報》。
- 新加坡《南僑日報》。

四、英文著作：

- Ch'i, Hsi-sheng,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Ann Arbor: The Univ. of Michigan Press, 1982)
- Eastman, Lloyd E.,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75)
- Eastman, Lloyd E.,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 Press, 1984)
- Fairbank, John K. and Feuerwerker, Alber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6)
- Fairbank, John 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 Rea, Kenneth W. and Brewer, John C. (eds.),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1946-1949*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1)